

中国马铃薯栽培史考略

谷 茂 马慧英 薛世明

(山西省农科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 山西大同 037004)

摘 要 对中国地方志记载的分析表明: 川、鄂、陕、甘交界的山区是马铃薯的最早输入地和栽培区, 并以此为中心向周围传播形成西南马铃薯主产区; 从马铃薯名称的演变可说明中国马铃薯栽培走向成熟的过程, 及以晋北为中心的华北马铃薯主产区和东北马铃薯主产区的形成; 论证了台湾和闽粤沿海不是中国马铃薯最早或较早输入地的观点; 讨论了研究中国马铃薯栽培史存在的 3 个基本问题。

关键词 马铃薯栽培史, 农史研究, 中国
分类号 S-09, S532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中部西麓的秘鲁—玻利维亚地区, 是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 但它为世界认识, 则仅有 400 多年历史。近百年来, 马铃薯发展十分迅速, 已成为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第 4 位重要的粮食作物^[1]。中国即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栽培面积达 308.7 万 hm²。与本世纪 30 年代相比, 面积扩大近 8 倍, 总产量增长 18~20 倍, 达到 36 800~48 000 万 t, 跻身世界第二位, 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农作物, 了解其栽培史必将促进其科研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以使它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1 中国地方志的记载和分析

根据何炳棣研究^[2], 中国地方志中有关马铃薯的资料远比同是从新大陆引进植物的甘薯、玉米和花生少。据已查到的可鉴别为有马铃薯记载的地方志共 65 种(见表 1)。

从这些地方志看, 最早记载马铃薯的是将其称为“羊芋”的四川《江油县志》(1812)和《绥靖屯志》(1825)。显然, 当时马铃薯尚属初始传播, 志书编纂者不理解乡民呼“羊芋”之意, 依音记录, 因为 1903 年重修的《江油县志》即改为“洋芋”。发生相同错误的还有陕西《邠州志》(1832)、贵州《毕节县志》(1879)和《甘肃通志》(1909), 发生类似错误的有四川《彰明县志》(1867)、《山西通志》(1892)的“阳芋”和四川《雷波厅志》(1884)的“扬芋”。此外, 现在公认记述马铃薯最早的农书《植物名实图考》(1848)也记为“阳芋”, 这充分反映了 19 世纪初中国马铃薯的传播面和影响面是很有限的, 属初始传播阶段。

从表 1 资料可略觅马铃薯传入中国西南区(含陕南、鄂西和甘南, 下同)的时期和路径。据四川《城口厅志》(1844)卷 18: “洋芋, 厅境嘉庆十二三年始有之, 贫民悉以为食。”《毕节县志》(1893)卷 15: “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 渐产此物。”陕西《郃阳厅志》(1883)载: “洋芋, 俗传此种系嘉庆时杨大人(遇春)自西洋带来, 高山民以为

主食。”而陕西和湖北最早的记载却为《*陕厅志*》(1829):“洋芋,此种不知所自来。山多种之,山民籍以济饥者众。”《*长乐县志*》(1852):“洋芋……向无此种,近来处处有之。”综合上述及表 1 资料的时间和地理分布,可以认为四川江油至现重庆城口,沿秦巴山南麓地区是中国西南区马铃薯的最早输入地和栽培区。由这里向四周辐射传播,向西北进入甘肃武都、天水,向北传入陕南,向东进入鄂西,向南经四川冕宁、会理和雷波分别进入云南和贵州毕节。上述地区至今仍是中国马铃薯主产区之一。

表 1 中国地方志记载马铃薯情况统计表 ^[2]										种
省(区)名	起止年份	地方志数量	名称分布							
			洋芋	羊芋	阳芋	扬芋	洋薯	土豆	爪哇薯	马铃薯
四川	1812~1931	24	19	2	1	1				1
陕西	1829~1921	8	6	1					1	
新疆	1846	1	1							
贵州	1847~1879	2	1	1						
湖南	1849~1870	3	3							
湖北	1852~1884	12	12							
山西	1892	1			1					
福建	1903~1929	4					1			3
甘肃	1909~1926	3	2	1						
上海	1918~1921	2								2
台湾	1921	1								1
吉林	1930	1						1		
黑龙江	1933	1						1		
辽宁	1934	1								1
察哈尔*	1935	1								1
总计	1812~1935	65	44	5	2	1	1	2	1	9

注:察哈尔原为中国行政省,地处内蒙、山西、河北交界区,1952 年撤销。

2 从名称演变看中国马铃薯栽培史

2.1 从洋芋的地方名看马铃薯在西南区推广

由表 1 可知,中国 19 世纪的地方志中均称马铃薯为“洋芋”(含谐音“羊芋”、“阳芋”、“扬芋”),无一例外。进入 20 世纪的地方志则以称“洋芋”和“马铃薯”并重,其他名称如“土豆”、“爪哇薯”、“洋薯”极少。

贵州毕节农科所于 1956~1959 年从全专区搜集 91 个洋芋品种,经筛选鉴定有 43 个表现好并列表记载^[3]。统计这 43 个品种的名称,有 24 个称洋芋,如“河坝洋芋”、“毕节白花洋芋”;有 12 个为地方名,如“深眼窝”、“巫峡”;有 7 个为选育或引进,如“岷县 15 号”、“赛白果”(Sebago)。这份资料表明,直至本世纪 50 年代末,称马铃薯为洋芋者在毕节还占大多数,仍属马铃薯传播的初期阶段,它反映了我国西南区 50 年代以前的基本状况。1983 年,我国出版《*全国马铃薯品种资源编目*》,该书共收编地方品种 123 个,其中有贵州品种 16 个。这 16 份品种中称洋芋者只有 3 个,地方名 13 个,说明此时马铃薯栽培在此区开始走向成熟。

上述资料表明,随着马铃薯引进时间的延长和推广面的扩大,不仅植物本身发生趋同适应,将自己融入新的生态环境,而且它的名称也融入新的社会环境,旧有的名称就渐渐

地消逝了。这一事实映证了马铃薯始于清代引入的史实。

2.2 山药的由来及马铃薯在山西、内蒙的拓殖

山药本名薯蓣, 乃薯蓣科多年生植物, 其中一个种在我国中北部栽培较多, 食味好, 营养品质高又有药用价值。山药原产于我国华南地区, 在京津一带不能越冬, 因而产量低, 在北方仅在庭院种植。在晋北, 这种山药作为珍稀食物也曾种植在农家庭院(近年来由于经济价值低被逐渐淘汰), 老百姓称之为“洋山药”, 显然它与马铃薯移花接木了。历史的真貌应是, 当马铃薯刚引入晋北时, 它也作为珍稀植物被种在农家庭院, 但由于它的块茎与山药的块根形状和食法相近, 人们就将这洋玩意儿称为“洋山药”。就如同西南区芋多, 把马铃薯称为“洋芋”一样。

但这个“洋山药”适宜冷凉地区种植, 迅速离开庭院走向大田。随清朝乾嘉期人口猛增, 凉凉区大片土地开发, 这“洋山药”如鱼得水, 反客为主, 成了“主要的田野作物”(1868~1872)^[4]。随着种植时间延长和新区开发, 人们渐渐地淡忘了它的“洋”身份, 呼之为“山药”, 而仍停留在农家庭院的山药(薯蓣)则被误为“洋山药”了。

山药在晋北拓殖成功后逐渐向南(太原)、向西(呼市)、向北(集宁)和向东(坝上地区)扩展, 山药之名也就随之传播开去。至今这些地区仍是中国马铃薯的主产区, 也仍称马铃薯为“山药”或“山药蛋”。

《马首农言》(1836)是关于山西寿阳农业的综合性农书。书中记有“回回山药花白, 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句, 联系吴其浚 1847 年在山西太原完稿的《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白色”, 说明《马首农言》中山药是指马铃薯, 时为刚传入寿阳不久, 故与蔬菜列在一起。至 1921 年刘逵九编著《山西农家俚语浅释》, 录寿阳农谚: “五谷不收也无患, 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时, 马铃薯已在寿阳广泛种植多年, 以致农民已总结出它抗灾保收的农谚。这就是说, 马铃薯从 19 世纪 20~30 年代传入寿阳, 到 19 世纪末成为寿阳成熟的栽培作物, 大约用了 80 多年。按这个规律推理, 根据利希陀芬提供的资料, 1868~1872 年“发见马铃薯在山西北部的高山地方和靠内蒙的边界地方, 为一种主要的田野作物”^[4], 则晋北马铃薯的引入应在 1780 年前后, 属中国最早传入区之一。正因如此, 本世纪 30 年代, 山西和察哈尔的马铃薯总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43%^[5]。

2.3 土豆名实演变及马铃薯在东北扩展

明中叶后至清前期, 一些古籍和地方志都提到“土豆”一词。如《长安客话》(约 1600~1610 年成书)记有“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 亦似芋, 而此差松甘”; 《畿辅通志》(1682)有“土芋一名土豆, 蒸食之味如番薯”; 《正定府志》(1762)中有“土芋, 通志俗呼土豆, 味甘略带土气息”, 等等。上述“土豆”究竟指何物? 明代大农学家徐光启有明确答案: “土芋: 一名土豆, 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 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 可灰汁煮食, 亦可蒸食。又煮芋汁, 洗腻衣, 洁白如玉。”^[6]此处之土豆绝非马铃薯, 而指土芋(芋的一种)。据张志^[7]介绍, 芋是天南星科植物, 我国也是原产地之一, 品种类型极为丰富。

此外, 1739 年《天津府志》记: “芋, 又一种小者, 名香芋, 俗名土豆。”这里的“土豆”显然与上述之“土豆”非一物。经查“花生和玉米一样有许多别名, 如香芋、落花生、土豆、珍珠豆、地豆……”。有关花生的历史资料表明: 花生初引入我国时曾有“土豆”、“番豆”等许

多异名,伴随它的传播这些名称也曾带到各地。但由于“花生”名与该植物特点相符,又好听上口,终致各类异名逐渐消逝。

那么,“土豆”之名是什么时候成了马铃薯的专用名呢?据表 1,1930 年《吉林通志》是迄今所知最早将马铃薯称为“土豆”的志书。此外,我国较早的马铃薯书中记载的农家种名只有东北称土豆,因此土豆一称是东北最先用于马铃薯的。

关于马铃薯在东北的引进和扩展,张畅^[9]的记述较为客观而中肯:“东北地区开始栽培马铃薯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大约 19 世纪末叶,东北区才有马铃薯的栽植。普遍的栽培是在 20 世纪的初年,关内汉民迁移,帝俄贵族流亡于东北和朝鲜族迁入吉林,都曾先后把马铃薯带入东北。敌伪时期又从日本引进许多马铃薯品种……马铃薯的块茎就是所吃的‘土豆’。”东北是中国起步较晚的马铃薯栽培区,但由于此区生态条件适宜马铃薯种植,因而发展最快,这里就不多讨论。京津一带称马铃薯为土豆是东北的马铃薯大量调进后逐渐形成的,现今,土豆的名称已扩展到河南、山东等省。

3 台湾和闽粤沿海各省不是马铃薯的最早传入地

1960~1990 年中国出版的关于马铃薯的专著或教材,多提到台湾和闽粤沿海各省是马铃薯的最早传入地,之后出版的书也将之列较早传入地。这种观点是由农史学家万国鼎在《五谷史话》中提出的,他认为我国文献中记载马铃薯最早的是福建《松溪县志》,后来的书又根据荷兰曾于 1619~1662 年盘踞台湾而做出上述推论。有人根据美国人 Laufer 提到的一条史料:一位于 1650 年到过台湾的荷兰船长 Strus 曾在其日记中记载在台湾见过马铃薯,且不言该史料的严肃性,就其提到的时间而言就足以自我否定。了解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史的人都知道,马铃薯在 1570 年引入西班牙后长期不为西人认识,且历经百余年始实现安第斯亚种向普通栽培种的进化。之后,才有了在北欧广泛种植的可能性。1650 年时,地处北欧的荷兰是否有了马铃薯普通栽培种尚无从证实,更谈不上由荷兰传入我国台湾了。显然,上述观点是错误的,依据亦不足,但这涉及马铃薯最早引入我国的时间考证问题,非本文能及,故不予详论。这里转引三条资料以说明台湾和闽粤沿海不是中国马铃薯的最早或较早传入地。

(1) 连横著《台湾通史》(1921,台湾)记:“马铃薯种出西洋,近始传入,蒸食最佳。”

(2) 潘士钊编著《食用作物》(1980,台湾)记:“台湾原无马铃薯的栽培,正式引种试种始于民国 10 年前后。”

(3)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引种场李芳洲先生考证并详述了新大陆植物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南瓜、向日葵、辣椒、凤梨的引进时间和地点。征引文献 57 种,其中有福建《松溪县志》(1700)和许多闽粤农书、志书、本草书,但他没有提到马铃薯的引进^[8]。

佐证以表 1 资料,1903 年福建《闽县乡土志》始有:“洋薯,种自欧洲到。”^[4]足以说明台湾和闽粤沿海各省是中国马铃薯栽培最晚的区域之一。

4 讨 论

中国马铃薯源自欧洲,这是无需置辩的事实。但涉及马铃薯栽培史的非专业甚至专业研究者却常忽略一个史实:中国栽培马铃薯是普通栽培种。而 400 多年前从南美洲引出的

马铃薯是安第斯亚种,它是在欧洲长日照条件下经过 100 多年的自然加人工选择进化为普通栽培种的,因而不可能在 16 世纪末或 17 世纪初引入中国。结合本文提及之史料,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在 18 世纪。作者认为在 18 世纪后期,但确切时间需进一步考证。

本文述及的两个马铃薯栽培源地均深居中国内陆,200 多年前其文化、经济和交通之落后是不言而喻的。马铃薯又有种薯繁殖且繁殖系数低、用种量大的特点,欧洲马铃薯究竟以何种方式进入这两个源地至今仍是谜。

根据马铃薯的生物学特性,因无性繁殖而致的病毒病害即退化问题以及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留种问题,都是考证其栽培史时必须正视的基本点,脱离这一基本点就无从谈马铃薯栽培史的考证。

参 考 文 献

- 1 关阳明. 世界马铃薯的生产现状及展望. 马铃薯杂志, 1993, 7(2): 126 ~ 128
- 2 何炳棣. 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世界农业, 1979(6): 25 ~ 31
- 3 毕节专署农业科学研究所编写. 毕节专区的洋芋.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60
- 4 瓦格勒 W 著. 中国农书(下册). 王建新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5 金善宝著. 马铃薯栽培法.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0
- 6 徐光启著. 农政全书校注(中). 石声汉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7 张 志. 芋的园艺学分类初探. 中国蔬菜, 1984(1): 30 ~ 32
- 8 李芳洲. 我国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的兴起与新大陆植物的引进. 植物引种驯化集刊, 1985(4): 93 ~ 100
- 9 张 畅编写. 东北马铃薯栽培.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2

A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History of Potato in China

Gu Mao Ma Huiying Xue Shiming

(Cold Region Crop Institute of Shan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Datong, Shanxi 037004)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ocal history showed that the mountainous border areas connecting Sichuan, Hubei, Shaanxi and Gansu were the earliest potato planting districts in China. The main producing area of potato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was an extension of this border areas. The evolution of potato name illustrated a process of potato cultivation in Chin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around Jinbei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and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The paper proved that Taiwan and the coastal areas of Guangdong and Fujian were not the earliest or the earlier potato planting regions in China. 3 basic questions on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tato cultivation we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cultivation history of potato, study on agricultural history, China